

中华浮图

■王川

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,汉明帝派中郎将蔡愔等十八骑到西域,一乘白马迎来了胡僧摄摩腾和竺法兰,从此佛教东传到中国,窣堵坡这一形式也随之来到东土。

《魏书》中说:白马寺,盛饰佛图,画迹甚妙,为四方式。凡官塔制度,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,从一级至三、五、七、九。世人相承,谓之“浮图”,或云“佛图”。

窣堵坡从此有了自己的中国名称:浮屠,佛图或浮图。

作为一种外来的建筑样式,窣堵坡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它生长发展的土壤,就此在中国长驻。塔是中国建筑中唯一的舶来品,它从遥远的西域循着丝绸之路,从印都库什山绵延到长安、洛阳,沿途布点,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。

先秦时的高建筑是以高台和楼阁为代表的,但以木结构为主建筑物的高度却是受到了材料的限制,当佛塔东来时,就与这种高耸的楼阁发生了联系。中国古代的宗教建筑与民用建筑之间并无一条鸿沟,不像西方建筑一样仅从外表就能将其功能区别。中国古代有很多人都是“舍宅为寺”,甚至白马寺也是根据皇家的招待所而改造的,在中国人的辞典里,“寺”和“庙”原来都不是宗教建筑,“寺”是衙署,而“庙”则是祭祀祖先的宫殿。所以,当官衙成了佛寺之后,就把里面高耸的楼阁改造成了佛塔,或者是根据楼阁而造成了佛塔。

窣堵坡的倏然东至,也给中国的文人提供了一道难题:先秦时从未见过这种建筑,传统的字库中竟然无字可以对应,400年里,只得勉强以译音“佛图”或“浮屠”来敷衍,既指寺庙也指佛塔。直到西晋时,葛洪才为它创造了一个字:“塔,佛堂也”。《说文解字》进一步注释道:“塔,西域浮屠也”,以后的《魏书》也正式肯定了这一命名。塔字从土,说明当初之塔大多是用土筑垒而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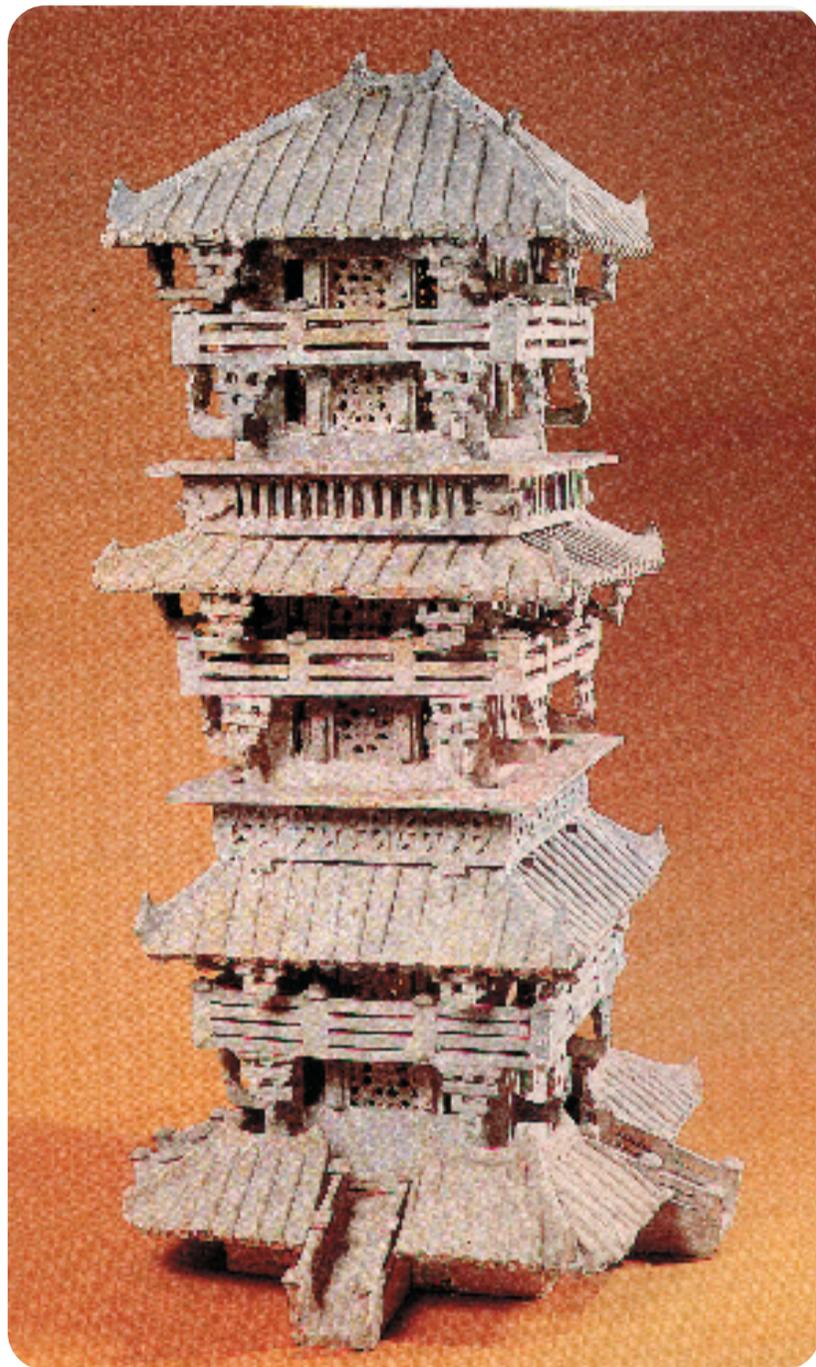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他所著的《中国建筑史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:

中国最初之塔之形式,古书中亦不留其迹,迨至六朝,始见于石窟寺之雕刻。而其最初之形,即为三重四重五重之多层形。塔身多作方形,间有多角者,即与今日所见之塔,根本上无甚差异。此多层之中国塔,与印度乃至西域古代诸塔,甚异其趣;骤观之,似无密接之关系,只塔顶之相轮有彼此联络之观耳。

伊东的这番话道出了塔之形制在中国演变的根本,那就是塔自从来到汉地之后,尽管经历了种种演变,但那塔顶上的相轮却是始终未变,这是印度窣堵坡顶上那三重伞形华盖的孑遗,也是窣堵坡在汉地所遗留的唯一痕迹。佛塔初来汉地,可能最初还保持着原有的覆钵式结构,但随后就与中国先秦时的多重楼阁形式相结合,渐而变成“上累金盘,下为重楼”的楼阁式塔了。窣堵坡唯有自传入中国之后,才有了形形色色的变化,不仅在平面上有方、圆、六角、八角和十二角的区别,层次上有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一、十三层到十五层的梯级,内容上有空心 and 实心的不同,材料上有石、砖、木、铁、琉璃、玉、铜等的区别,甚至在排列上也不仅为单塔,而是有了双塔、三塔、列塔、塔林、百塔甚至一百零八塔这种煌煌大观的数字。就用途来看,塔也不仅仅为佛教所专有,而是出现了风水塔、料敌塔、灯塔、水塔、文笔塔甚至电视塔、铁塔等非宗教的品种了。

塔是一种奇妙的建筑。在佛教徒的眼中,塔是释迦牟尼的象征,拜塔即礼佛。美学家说,中国建筑讲究的是平面展开的整体复杂结构,而不是一座座独立自足的向上堆起的单纯的尖顶,塔以一种纵向的结构打破了中国以横向结构为主的建筑趋向。哲学家眼中的塔,是一种从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的物化。建筑学家的眼中,塔是一种可以提供纵向空间架构的实体,将宗教性和装饰性巧妙结合,是东西方建筑文化交相融合的一个成功实例。

塔是中国2000年历史中最具诗情的一种建筑物,它并没有因为它是舶来品而被人歧视,反而与中华文化最为融洽地结合起来。塔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万众瞩目的大哥大,至高无上的地位足以矜夸,是任何建筑都无法替代的。尽管它是外来之物,然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,它并没有“化于胡”,而是“化胡于我”。



汉代的陶楼



敦煌壁画中